

■相望江湖

# 分利性利益集团已成社会进步大障碍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去年年初,我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关于工资结构与一流人才的文章,事后收到有不少专家和博友给我写的信,提了不少建议。最近有几条新闻让我觉得有必要回头再谈谈工资结构、人才流动以及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性。

稍早些时候,国家公务员考试,周边的考生都提前赴杭州赶考,杭州城里所有宾馆一律客满,房价也提高50%左右。据国家人事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07年全国有80万人报名参加,其中64万人通过审核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人数创下了历年之最,竞争的平均比例为1:162,最热门的职业已达到了1:3592。

差不多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超4.88倍,垄断行业争议最多”的评论,该文引用了相当翔实的数据:2000年,我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最低水

平的2.63倍,到2005年,差距拉大到4.88倍,并呈现进一步拉大趋势。国际公认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目前,我国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至3倍,加上福利待遇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间。

我们如果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考虑,或许就能明白眼前工资结构的危害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第一个事件恰好证实了我本栏曾提到的工资收入悬殊差距下的人才流动问题,正是因为公务员和这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大家才不管是否适合自己,也不管是否与自己能力匹配,对这些有限岗位资源趋之若鹜,甚至还出现了考公务员的“专业户”。倒挂的人才结构就在这种工资分布中越发凸现出来了:大家都不愿意到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中去,这种对风险的规避使得整个社会失去了在未来寻求利润和盈利机会的发展可能性。没有优秀的人才大量补充到这些竞争性企业,企业的科研和市场开拓根本没法得到实质性的铺展和提高。而如果企业没有好的盈利方式和高利润水平,没有良好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盈利能力,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当然,这还只是静态的结果而

已。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最经典的一价定律(the One-price Law),那么这些非均衡的行业差距和悬殊的工资水平都可以在短期的人才流动之后达到均衡的一价水平之上。但实际上,考虑到制度的内生性,整个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远没有如此简单的一价规则。当今最富有创见力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最近的一本畅销著作《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和一系列研究论文中,就论证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制度,不太可能通过经济上的竞争来达到资源配置的一价定律。因为那些已经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人,非但没有激励放弃这些既得利益的可能性,更有可能的是利用眼前的权力,通过经济决策上的便利安排,来设置各种行业的进入壁垒,限制其它人能够自由流动,从而独获这些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第二个事件说明了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的工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通过人才流动的经济内生手段,或者行政性的外生性强制手段来弥补,反而在长期的政治拉练赛中越拉越大。由于这些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往往在政治上普遍存在的权力垄断,造成了这些垄断行业和其它竞争性行业在人才流动和资源配置上很有激励维持特殊的收入差距。更危险的是,那些进入垄断行业的精英们会通过更加苛刻的、更高的条件壁垒,彻底关上进入的大门。

而作为底层的社会大众只能获取低于全社会平均的收入水平,一旦预期到没法通过努力跨越利益集团分设的这些壁垒,那么很有可能会彻底放弃原先的投资,把所有的投资都高度贴现到现期来实现,这就产生了经济学家最担心的“流动性陷阱”。此时,会有一个可怕的社会现象出现:一方面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分配,不惜任何代价,直至所有资源都消耗在寻租活动上。这也就是奥尔森反复强调的分配过程中的“抢瓷器”现象:闯进瓷器店里的哄抢者,抢走的总是很少,大部分的昂贵瓷器被砸得稀巴烂:我拿不走的东西,你也别想拿走。而另一方面,大家都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毫无兴趣,也对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毫无信



蒋玉磊 制图



心,整个社会中充斥的尽是那些短期的分利性短期投资,而对于未来发展的长期投资严重不足的社会,当然也就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机制。

既然我们现在的人才结构是个倒挂的,最没效率的人才结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呢?

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了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摧毁分利性的利益集团。他以非常详细的资料和数据说明了日本、德国两个战败国经过战争之后,利益集团已经被彻底破坏,集团之间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同时也被摧毁,而新的集团力量弱小,还不足以左右政府的政策制定,经济因而能突飞猛进。法国的情况是长期的不稳定与增长同时存在。因为在动荡的环境中,利益集团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所以在法国在二战后经济也有快速增长。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也是长年无战事,但却有比英国好得多的经济增长

记录的原因,主要是这两国均有强大的、且成立时间较长的特殊利益集团,但这些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广泛性集团,这种组织有考虑社会利益的动机,不是通过分利,而是通过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来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

从奥尔森的理论和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分利性利益集团的存在极大地破坏了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发展动力。而我们担心的也正是这点:目前中国行业之间悬殊的工资收入差距正促成分利性利益集团的形成,这些新兴的分利性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权力上不对等的垄断优势,把持社会中最关键的重要资源,从而使整个国家一方面陷入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的通胀困扰,而另一方面长期性投资严重不足,缺乏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经济学家麦迪森曾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历史事实: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开始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丰裕也就不过最近一两百年事情而已,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类型更好,而是在历史的车轮中我们能做的要比不能做的事少得可怜。不过,所幸的是,在中国改革的三十年征途中,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实际上或许还能继续做得更多,目前正在热议的工资改革就是其中一个可能而且也是亟需做的事情。

■蜜蜂寓言

## 地产商的嗅觉

苏小和  
财经作家,现居北京

眼下的房地产市场,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一方面,流动性过剩背景下的过旺需求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另一方面,政府却继续以绝对垄断的管理方式,人为地减少土地供应。如此,这么一个简单的供求曲线,我相信稍微有一些经验的地产商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但管理层似乎不愿面对这样简单的供求关系,扯开了嗓门对着市场喊话,称“信贷过快增长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或者加紧出台降温政策,紧缩信贷规模,在老百姓购买第二套房屋时,用行政措施提高首付比例等等。

但唯利是图的地产商人们似乎不愿意按照管理层的暗示行走,他们能在政府的调控措施中解读出更加积极的意义。比如信贷过快增长,这显然不是银行有意为之,而是市场的拉动,银行也是企业,也需要效益,明明存在清晰的盈利性市场,岂有不放贷款之理?老百姓购买第二套房,说明老百姓有需求,也有购买能力,政府提高首付比例显然难不倒他们,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好办法。

凡此种种,显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接下来一段时期内不会出现大的逆转。多年以来迷恋GDP发展速度的偏向,在短时期内彻底纠正似乎可能性不大;金融市场在垄断政策的驱使下,事实上存在相当大的扭曲,大量的地下资金一直让国内的金融宏观调控乏力。难怪,有一位地产分析师表示,整个市场已经第三次或第四次受到类似政策的影响,但所有的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从当年的惊恐和彷徨中渐渐圆熟了。

有一个更加具有诱惑力的地产蛋糕存在,地产商人们闻到了大把大把金钱的味道。

首先是外资。尽管中国地产业趋紧的政策环境已成共识,外资却大有逆势扩容之势。英国《金融时报》12月10日称,高盛拟将新募集的21亿美元房地产基金主要投向亚洲,尤其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为其重点。另一家国际投行地产基金负责人分析说:按基本面向来投资,中国在高盛的新基金中“至少会占到一半以上”。事实上,2007年下半年已经完成募集的类似国际地产基金不在少数,有的坐落香港,有的直接落户中国内地,2008年将是他们又一个热气腾腾的红利之年。

国内的地产商人们也在按照上述思路行走。尽管有人在竭力唱衰,说什么拐点即将来临,房价将会迅速回落,但我所熟悉的房地产商人们却在四处圈地,大兴土木。杨氏碧桂

园的圈地豪情和在香港圈得雄资的行为可以说了,潘石屹在北京拿到了大把钱也在香港圈到了大把资金,也可以不提了。就提一提坐镇北京、放眼全国的地产大佬世纪金源的黄如论先生吧。黄先生在北京的楼盘一直就比潘石屹、冯仑、任志强之流要豪迈很多,只是黄一贯行事低调,不经常露面于媒体而已。眼下,黄先生的战略有所调整,开始远离北京,前往外省发展。据了解,世纪金源在重庆、云南、湖南、贵州、陕西等地均有大楼盘开张,每个楼盘的投资规模甚至都在百亿之上。而且,2008年还有可能是世纪金源的上市之年,他们已经在具体操作这方面的事宜。至少,据我所知,他们磅礴的商务酒店产业、shoppingmall产业,以及他们在各地拥有的地块,稍一整合,即能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奇怪的格局。政府不满意,银行有危机,老百姓需要住房,地产商要赚大钱,整个市场似乎刹不住车,每个人都被深深地裹挟在某种命运之中。肯定是某个更加重要的环节出了毛病。现在我相信,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的元制度有问题。

北京少壮派经济学家赵晓说得对:尽管政府早就提出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市场化也罢,房地产调控也罢,几乎没有涉及到房地产市场的基础制度——产权制度的变革。赵晓认为,房地产市场如同其他市场一样,其实是一个制度体系,而产权乃市场的基础和根本。在没有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之前,哪怕“房地产市场”叫得震天响,哪怕它的市场化已经推进了十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仍是一个产权缺位的市场,而这样的“市场化”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轻易就能发现,在地产商、消费者和银行相互纠结的房地产利益格局中,真正拥有话语权,真正掌握暴利的,却处在隐性状态,这个隐性人就是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不仅资金要素牢牢控制,土地也被牢牢控制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收益,绝大部分流进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腰包。这是一个在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损失为代价。如此,只要管理层要保证必要的发展速度,只要当前的财税体制不更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会一直火热,地产商人们很了解这一点,甚至消费者也可能明白这一点。

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宿命,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恕我直言,暂时还看不到走出这一轮宿命的具体时间表。

■醒客一周

## 民工换代后,人口红利还有多少?

——经济微观观察系列之四

周年洋  
学术编辑,专栏作者  
现居北京

新年伊始,笔者学理发的两个侄子发信息让我参加他们的理发店开业仪式。他们俩刚学了两年手艺,就耐不住家人篱下的打工生涯,要尝试自己开店了。早几年,笔者的第二个侄子就离开老家到广州开大巴去了,去年年初已与朋友合伙买了大巴,做起自己的生意来了。笔者的这三个侄子都是80后的新一代农民,他们在思想观念、生活追求上已经完全背弃了父母辈,既不愿老死在农地上,也不愿到工厂里辛苦打工,他们已经开始挑剔工作了。

据我的观察和了解,在我老家那个地方,年轻人不愿去工厂打工,而是找比较自由或自主的工作,几乎成了很普遍的现象。从新闻中,现在常常听到民工荒的报道。除了上一代农民觉得工资太低以外,另一个可能就是农民劳动力逐渐换代引发的后果吧。

上一辈民工成长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接收的外界信息有限,对于现代人的各种享受毫无概念,吃饱穿暖成为他们最大的希望。只要能够挣到比在家务农多一点的工资,不管多累多脏的活,他们会无怨无悔地去做。

但是,他们的下一代是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从电视里了解了外面的精彩世界,各种现代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向往和追求,要求获得尊严和平等的意识特别强烈。他们知道什么是体面的生活。不再满足于获得温饱,更难以想象还会去默默忍受最脏最累的活。他们希望选择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

也希望有职业生涯计划,不再像他们父辈一样有工作就干,他们希望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

进入21世纪后,80后一代农民开始成为主要劳动力,中国农民的结构发生了很大转变,但社会似乎没有对人口结构已经悄然发生的变化做出应有的反应。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民工在工厂打工的收入一直变化不大。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求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外资,资本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强势,民工的工资一直被压得很低,农民打工的收入与整个经济成长的速度不匹配。如今,愿意干苦力的民工在持续减少,工厂打工的工资却迟迟不见增长,观念新一代农民成了劳动力市场主体了,怎么可能不闹民工荒呢!

不少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时,把人口红利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视为主要的因素。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水平很低,仅仅只有不到2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由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此前出生的大量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为劳动主力,改革开放大潮正好赶上这批适龄劳动人口大量的涌现。这种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比例较低的人口结构,非常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有专家认为,在1982年至2000年中国的GDP增长中,人口红利的贡献比率高达26.8%。但如果再往更深层去想,人口红利到底是哪部分人口的红利呢?

在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是年轻农民,这些民工涌向城市,他们正是从那里逐渐兴盛起来的乡村企业、民营企业的劳动主力。

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出口,最早开始出口和占大部分出口份

额的是制造加工类企业,更具体一点说是制造衬衫、玩具、鞋帽、电子产品等等的企业。近10年,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贡献因素,各个大城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不仅增加了中国的GDP,也大大增加了中国城市家庭的财富。谁在这些工厂里一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呢?不就是那些离乡背井到城市来的打工仔、打工妹么?谁在夏日里流汗冬日里忍受寒风建造这些楼房呢?不也是这些青壮年农民大军么?他们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没有医保、社保,他们的月薪,只是从多年前的400元到现在的不到1000元。

自从放开人口流动政策后,亿万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据人口普查资料,一年之内在城镇常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口超过两个亿,加上短期流动到城里找机会的民工,保守估计也有3个亿。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了:相当于美国加上欧洲劳动人口的总和!而这些人除了低廉的薪水,什么也没有,这么一个巨大群体的低报酬、高贡献,不能不说是中国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所以说,从对中国改革开放贡献度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更多是农民红利。如果按照10年代来划分的话,那么至少已经有三代农民廉价劳动力以他们的坚忍和勤苦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着奇迹。

既然人口红利更多是农民红利,那就需要我们正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那些做最脏最累的活却只拿最低工资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少了。要想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要大幅提高民工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给民工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尤其是要严格执行今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如果再赶紧做这样的安排,人口红利的消失会远远快过各方的预期!

■浮世微言

## 台湾民众的眼神:迷茫与无奈

杨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副研究员

对于我们这些听着“阿里山的姑娘美如画”而成长起来的70后人群,台湾代表了一种质朴的温情。在剥离了政治因素纷扰后,带给我们的想象,便是那种特有的亚热带田园的自然,蕴含着游子思乡的淡淡忧伤。

此前不久,笔者去台湾参加了一次两岸学术交流,充分体味了令人难忘的宝岛风情。由于两岸没有直航,我们只能通过香港转机。在空荡荡的转机大厅里,观光客稀稀落落,似乎暗示了两岸关系的寒冬。此后,在台北几天的学术研讨和交流,虽然宾主都热情有礼,但却似乎总有些隔阂,这也是当前众多敏感因素的作用。主要活动安排在台北蒋经国会议厅,这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我曾有一段时间醉心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也知道蒋经国先生早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时,导师正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并深受其经济思想的影响。台湾日后经济起飞,这位前辈经济学家贡献颇多。台北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路驱车南下,最终从台湾本岛南端的高雄,结束了本次行程。虽然只是浮光掠影,难以窥探深层的社会特质,但通过窥豹一斑,也对台湾经济社会有了更多感性认识。

台湾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由于处于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又有喀斯特地貌与海蚀地貌,故多山水胜境,清代就有“八景十二胜”之说。至于阿里山和日月潭,虽然没有传说中的“惊为天入”,却自有其独特魅力。然而我注意到,在这本属旅游旺季的日子里,各旅游景点却游客寥寥。而且,旅游服务业显然还比较落后,如阿里山这样的名胜,几乎还处于未开发状态。缺乏游客资源,尤其缺乏大陆游客的支持,恐怕是台湾旅游业面临萧条的重要原因。而这背后,也是台湾当局人为限制的结果。据调查,从目前大陆游客平均每日购物消费额来看,来自大陆的游客以近50美元的额度位居榜首,而目前大陆居民赴台观光的人数年均仅约1万多人。

沿途路过的中小城市和乡村,令人在感慨昔日“四小龙”之首的成绩之余,却又感到与新市场的繁荣不啻冰炭之别。近年来,台湾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全面下滑,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也处在惨淡经营之中。据台湾的一项调查,2007年第三季度整体房价信心综合得分只有88分,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分。回想上世纪90年代两岸经济蜜月期,台湾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曾平均达8.5%,比较起来,当前的衰退除了经济周期因素,台湾当局的政策失误实在难辞其咎。另外,台湾目前97%的进口砂石来自大陆,今年大陆基于环境资源保护而禁止砂石出口后,对台湾建筑业带来巨大冲击。虽然将来可能采取惠台政策而开放对台出口,但这种大陆民众对台湾民众的福利补贴,显然也不会使某些政客们怀有更多感恩之心。

对于大陆观光客来说,随着人民币走向强势,近年来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旅游时,最方便的就是经常可直接用人民币支付。在台湾,且不说人民币不能用,更不方便的是,很多旅游购物点根本找不到可以兑换美元的地方。众所周知,台湾的金融业曾经历长期管制,虽在2002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但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增长的态势也很明显,金融机构规模过小,银行管理不透明,风险管理失控等金融缺陷,也是台湾经济下滑的致命伤之一。经过几次大的改革,目前台湾金融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已提高到12%左右,但总体上仍未走出困境。2007年10月底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了最新竞争力评比,在131个国家和地区里,台湾银行健全度排名沉沦至第114位,使民进党这几年喜欢炫耀的金融改革成绩大打折扣。

根据美国智库CATO发表的2007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在全球141个接受评比的国家和地区中,台湾从2006年24名大幅退步至第38名,位居亚洲四小龙之末。2007年10月台湾物价上涨5.34%,创下13年来的最高纪录,加上岛内外研究机构纷纷下调2008年增长率预期,这些都使台湾经济增添了陷入“滞涨”的风险。另外,据统计,从1997到2006年,台湾受雇人口总薪资报酬占当年GDP比重,从49.4%下降到45.6%,由此可见,经济成就没有充分转化为社会福利的增加,也是台湾民众怨声载道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台湾经济衰退的症结,很大程度上是非经济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台湾当局“政治挂帅”的扭曲效果,另一方面则是处理两岸关系的失措。诸如金融部门不能到大陆投资,投资大陆上限不能超过公司净值40%等规定,使台湾经济更难分享大陆经济的繁荣。事实上,在民进党“远离大陆”的经贸政策指引下,台湾经济转型的瓶颈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岛内民众的投资消费信心也难以重振。如此下去,会重蹈菲律宾的覆辙也未可知。在政治动荡的蹂躏下,经济明珠的风光不再。

记得乘车路过嘉义时,在市中心曾经作为地标孙中山像前瞻仰,没想到回到北京不久,就从新闻听到这座雕像在雷雨中坍塌的消息。中国人喜欢以意外事件作预兆,对此,泛蓝称是“国家有难”,泛绿则称“建国良机”,这也是台湾政治僵局的缩影。无论政治怎样热闹,受伤害的总是公众。难怪,笔者所到之处,从众多台湾普通人眼里,都能看到一种迷茫与无奈。